

黎明的曙光

——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
斗争中的风云人物

康 昭 吴增田 杨 光

李恒基 凌忠贤

编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康 昭 (1)
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	(3)
麦萨利·哈吉：阿尔及利亚革命不幸的先行者	(12)
摩洛哥独立的先驱：阿拉尔·法西	(28)
摩洛哥国王哈桑一世	(35)
阿布希里和坦桑反抗德国统治的斗争	(43)
拉明·盖耶的一生——从旧非洲到新生的塞内加尔	(57)
马巴：武装反抗法国对塞内冈比亚征服的领导者	(71)
塞缪尔·柯林斯·布鲁：加纳商人与合法贸易的发展	(85)
克瓦库·克索努：阿布隆王国的末日	(100)
阿波美抵抗法国殖民入侵的英雄贝汉津	(128)
抗法战争中的娘子军	(135)
马丁-保罗·桑巴：从服役到起义	(144)
恩儒瓦亚：一位巴蒙素丹的改革与反殖斗争	(165)
中非独立的预言家——卡尔努	(182)
巴泰勒米·博冈达：中非的民权保卫者和幻想家	(197)
翁戈：一位反抗苛捐杂税和强制劳动的加蓬酋长	(215)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安德烈·马佐阿	(227)
芒杜姆和奥万博族反抗安哥拉的葡萄牙 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235)
根根亚纳和莫桑比克十分艰难的谈判	(249)
马拉维民族主义的先驱者约翰·奇伦布韦	(262)
莫索索一世与莱索托王国的诞生和发展	(274)

前 言

非洲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大陆。勤劳智慧的非洲人民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15世纪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先后对非洲发动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侵略和掠夺达到了高潮。至20世纪初叶，整个非洲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非洲人民从殖民主义入侵之初，就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以后，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征服和掠夺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五个世纪以来，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激烈变幻的政治风云，在非洲政治舞台上造就了一批批叱咤一时、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至今仍在非洲人民中广为传诵。

法国“青年非洲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一套系列丛书：《非洲人物志》，共12册巨型本，约150万字。这套丛书介绍了从公元前几千年的埃及法老，一直到60年代初在非洲有影响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达121人之多。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夏尔-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马加利·莫尔西(Margali Morsy)、卡特琳·科克里-维德罗维奇(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伊夫·佩尔松(Yves Person)。法、英、美三国等西方国家的著名非洲学家以及非洲各国众多的专家、学者都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为了真实地介绍非洲领袖人物，他们不仅参阅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大量官方档案资料，还亲自到非洲当地搜集了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因此，这套丛书是一部全面介

绍非洲主要历史人物的大型学术著作。

为了推动我国对非洲历史、特别是对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历史的研究,我们决定从上述丛书中挑选部分人物传记,采取摘译和编译的形式,奉献给我国的非洲学术界。本书介绍的21位非洲风云人物,主要是19世纪前后,殖民主义国家大规模全面入侵非洲之际,领导非洲各族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重要人物。当然,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舞台上涌现的风云人物,远不止本书中介绍的这些人。有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如:几内亚抗法斗争的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安哥拉巾帼英雄恩津加,津巴布韦反抗英国入侵的领袖洛本古拉,南非反抗白人殖民统治的国王恰卡·祖鲁,等等,在国内介绍较多,已为我国广大人民所熟悉,故不再介绍。这里介绍的21位风云人物,都是在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舞台上起过较大作用,在非洲人民中有一定影响,而又因介绍不多,我国人民对他们不很熟悉的人物。我们相信,通过本书所作的虽然是很不全面的介绍,也可以使我们看出早期非洲人民为反抗殖民侵略、维护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一些概貌。

由于水平限制,本书在选编和翻译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国内学者批评指正。

康 昭

1988年9月21日

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领导的 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

大多数经历过征服阿尔及利亚时期的人认为，阿卜杜·卡德尔（Abd-al Qadir）是阿尔及利亚人民15年反抗事业的化身。在为民族和自由而战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自由党人为“阿拉伯人民在一位民族领袖的领导下觉醒”而欢呼，并且热情地推崇阿卜杜·卡德尔为“阿拉伯民族的中兴者”或捍卫者。1843年，法国战争部长苏尔（Soulé）将军把他和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高加索司令官沙米尔（Chamyl）一同列为“可以够得上授予伟人名号”的三位当代人物。拿破仑三世皇帝也曾经认真考虑使这位“阿拉伯民族英雄”成为东方阿拉伯王国的君主。

在帝国主义时代，阿卜杜·卡德尔倍受责贬。

自从非殖民化时期以来，他又一次被尊奉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英雄。他证明了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在经受三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仍然可能复兴，从而燃起了一种希望。他的同胞们怀着这种希望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

1930年7月5日阿尔及尔被攻占之后，居住在今日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居民的反应是极不相同的，但是没有普遍发生反对基督教入侵者的运动。在奥兰，各部落得知土耳其的奥加（Odjaq）被推翻之后，自发地奋起反抗它们的压迫者。库鲁格鲁部落（Kû-lûghlû）则情愿与法国人接近，以便对抗它所鄙视的阿尔及利亚人；而宣称前来打击土耳其统治、从而使居民们成为“他们故乡土地的独立的主人”的法国人则时常与这些半土耳其人或者他们的马赫曾（makhsen）部落相互勾结。在君士坦丁，艾哈迈德

(Ah'med) 贝伊依靠当地封建势力维持着土耳其政府。在提特里 (Tittri) 部落联盟之间战事纷纷。

根据穆斯林们回忆，这是一个弱肉强食、对外扩张野心昭然若揭的“天下大乱时期”。摩洛哥素丹阿布德拉赫曼 (Abderrh'mân) 企图在特莱姆森 (Tlemcen) 建立统治，突尼斯城的贝伊试图在法国人羽翼下在奥兰设立一个突尼斯贝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失败了。

在梅斯加拉 (Mescara) 及其周围地区，各部落决定把权力赋予一位当地人，让他领导反抗法国的运动。这些部落选择了西迪·穆依·阿丁 (Sidi Muh'yî ad-Din)。他是著名的伊斯兰教隐士、谢里夫出身的贵族、卡第里亚 (Qâdiriya) 宗教社团的穆卡迪 (moqadim) 和距梅斯加拉 10 公里以外阿尔哈玛 (Al-Hammân) 河边盖特那 (Guetna) 的扎维亚首领 (Chef d'une zâwiya)。不久，这位虔诚的隐士在几次攻打奥兰不克之后，于 1832 年 11 月 21 日指派他的儿子为作战首领。

他的儿子哈吉·阿卜杜·卡德尔 (El H'ajj Abd-al Qadir) 出生于 1808 年并且一直在盖特那生活到 1822 年。此后，他到奥兰的一所学校就读。在这个贝伊属地 (beylik) 的都城里，他认清了土耳其的统治。他的性格慷慨豁达，但是容不得土耳其人的亵渎和傲慢。从此，他便同土耳其人结为仇敌。他始终不渝地同压迫人民的库鲁格鲁部落和土耳其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升任各部落的统帅之后，并不自称帕夏，而是以信徒的埃米尔和阿拉伯人的素丹自居。为了象征性地表明实施新权力的合法性，他住进了梅斯加拉的贝伊们从前居住的宫殿。在那里，他宣布要结束混乱局面、对奥兰的基督徒作战并且全面实施《古兰经》的法律。1833 年，谢里夫部落也承认他为素丹。但是由于对法国作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阿卜杜·卡德尔明智地同意与法国将军德米歇尔 (Desmichels) 谈判。

由于德米歇尔急于缔结和约并且幻想把阿卜杜·卡德尔变成

法国人的附庸，他向阿卜杜·卡德尔提出了一份措辞含混的正式和平条约和一份与巴黎政府意图相左的秘密条约。阿卜杜·卡德尔获得了一个用以输出粮食的港口和购置军需品的自由，此外，法国占领下的奥兰市和摩斯塔加奈姆(Mostaganem)市居民可以自由离开这些城市。这个条约正合阿卜杜·卡德尔之意。他岂能拒绝一个对他有利、把他奉为信徒们的埃米尔的条约？德米歇尔将军如约行事，向阿卜杜·卡德尔供应武器和军需品。但是受到基督徒承认和援助的埃米尔却违背了穆斯林君主不得与异教徒打交道的义务。他众叛亲离、四面受敌。他的亲兄弟率领达尔卡维亚(Darqâwiya)宗教社团反对他，他还不得不同梅德亚(Médéa)的头人哈吉·穆萨·达尔卡维(Haj Hûcâ al-Darqâwi)作战。但时隔不久，他战胜了一些有名望的部落首领，尤其是战胜了穆斯塔法·本·伊斯梅尔(Mûçtafa ben Isma'il)，恢复了声望。他得到了米利亚纳(Miliana)以及阿尔及尔和底特里的部落的拥护。这些部落在1834~1835年打败法国人之后归顺了阿卜杜·卡德尔。

事实上，法国人在对待阿卜杜·卡德尔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德米歇尔离去之后，他的继任者特雷泽尔(Trézel)对埃米尔持反对态度，而且在玛克塔(Macta)战斗中(1835年6月28日)受到毁灭性打击。蒙受耻辱的法国人向埃米尔的都城梅斯加拉发动了征讨。城市被攻陷之后，阿卜杜·卡德尔的贝伊领地分崩离析。他又一次被许多部属抛弃。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他恢复了政权并且在塔格代(Tagdemt)建设起新的都城。然而他懂得，要想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必须要有几年的和平时间。他巧妙地利用法国舆论的和平愿望和多雷蒙(Daurémond)总督与布热(Bugeaud)将军之间的不和，同后者订立了一份十分优惠的条约，即塔夫那(Tafna)条约(1837年5月30日)。法国人撤回沿海地带，实际上把国家交给了阿卜杜·卡德尔。布热在秘密条款中甚至保证向他提供武器并且疏远马赫曾部落的首领。在取得

这一外交胜利之后，阿卜杜·卡德尔于1837~1839年期间致力于使南部和东部桀骜不驯的部落承认他的权威。在战胜撒哈拉的部落并且争取了大量部落首领之后，他收服了阿尔及利亚2/3的地区。他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法国在征服君士坦丁并且统治了君士坦丁市之后，打算背弃塔夫那条约。与基督徒和解的政策在穆斯林中也不得人心。1839年7月3日，塔扎（Taza）大会决定恢复战争状态。11月20日，圣战开始。这次圣战一直持续了八年，直至1847年的12月。

1840年12月，已经担任总督的布热推行从经济上摧毁阿卜杜·卡德尔国家的总体战计划。他要摧毁阿卜杜·卡德尔国家的城市及其设防要地，要“控制阿拉伯人的农业，不经我们批准，不许阿拉伯人播种、收割和放牧”。布热和他的校尉们在占领梅斯加拉之后，又捣毁了塔夫拉乌（Tafraout）、萨依达（Saïda）、塔扎（Taza）、博加（Boghar）、塞卜杜（Sebdou）诸城。法国人的“行动纵队”袭击部落、抢掠存粮并且伏击阿卜杜·卡德尔的部队。面对这种形势，阿卜杜·卡德尔只能回之以突然袭击并且对降敌部落给予报复性打击。1842年底，布热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他写道：“阿卜杜·卡德尔失去了他的国家的5/6、所有的据点和储备以及他的常备军队，更为惨重的是，失去了1840年以前的威望”。埃米尔被打退到南方，逐渐失去他的王国的国土和经济根据地，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战斗。他重新成为贝都因战士，率领着他的部下和畜群、他的忠诚的部落和正规军战士一直退却到高平原的最南部地区。1843年，在向伊贝尔阿木尔（Jbel Amoûr）转移途中，几万人的行营遭到路易·菲利浦之子达玛尔（d'Amale）公爵的突然袭击和劫掠。这次失败对阿卜杜·卡德尔的威望是个沉重打击。阿尔及尔省的部落抛弃了他，他的军官只能指挥撒哈拉人和下卡比利（Basse-Kabylie）的几个部落。从那以后，法国将军试图生擒他本人及其家庭剩余成员。经过七个月的追击，他损失了最后一批正规部队。他的最

优秀的军官本·阿拉尔(Ben Allâl) 在梅腊 (Melah) 河战斗中丧生。1843年,阿卜杜·卡德尔不得不到摩洛哥避难。

1844年9月10日,法国和摩洛哥在丹吉尔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素丹宣布阿卜杜·卡德尔在他的帝国各地不受法律保护。阿卜杜·卡德尔受到直接的威胁,并受到法国和摩洛哥部队的夹击,处于绝望境地。他试图带着他的家族返回阿尔及利亚。当他率领着3000名残部穿过摩洛哥人的炮火、成功地渡过穆鲁耶河以后,发现阿尔及利亚南方的道路已经有法国人把守。毫无疑问,他可以带领一些骑兵冲过去,但是为了拯救伤员、妇女和儿童,他宁可向法国人请降。法国临时政府决定把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部属囚禁于德班 (De pan)城堡,后来转移到昂勃瓦兹 (Amboise) 城堡。

1852年10月16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自来向阿卜杜·卡德尔宣布恢复他的自由。阿卜杜·卡德尔满怀感激之情,到巴黎向路易·拿破仑致谢。后者赐给他每年10万金法郎的丰厚生活费。随后,他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布尔萨,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来他被获准到大马士革定居。在那里,他同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特别是一些流亡在外的老战士重新相逢。当1860年德鲁兹人大肆屠杀马龙派时,他同老战士们驰援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并且搭救出几千人。阿卜杜·卡德尔受到一致感激,被授予庇护九世勋章。拿破仑三世授予他荣誉军团大绶带。梅及第 (Médjidie) 素丹授予他一级勋章。

当法国决定远征叙利亚时,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支持奥斯曼人压迫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大宣传。建立一个以阿卜杜·卡德尔埃米尔为君主的阿拉伯国家被说成是“东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阿卜杜·卡德尔为伊斯兰教的毁灭而痛心,不愿被法国的政策所利用。尽管当时巴黎的报界已经把他捧为“阿拉伯皇帝”、大马士革的亲王或者叙利亚的总督,但是他对于法国军官的封官许愿却避而不受,并且表示“反对法国部队进驻大马士革的想

法”。1865年8月，拿破仑三世再次劝说 he 出任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君主，他又一次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1883年5月26日，75岁的阿卜杜·卡德尔死于大马士革。

研究阿卜杜·卡德尔的欧洲人往往首先把他描写成一位宗教人物。同样，穆斯林们提起 he 这个人物，也说 he 具有十全十美的信徒形象和品格。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用当时的思想去解释人物。

对于19世纪的穆斯林来说，老战士并不是“反抗者”或者革命的“拥护者”的同义词，而首先是指手持武器传播和捍卫其对真主的信仰的信徒。

阿卜杜·卡德尔作为伊斯兰教的学者，从来没有以先知传教自比，而仅仅以一名真主的信徒自居。他号召“兄弟们”为真主而战，因为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除了安拉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威。

由于最初的成功和他的公正，他赢得了民众。因为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公正的品德和真主的恩宠是合法行使权力的基础。他对自己的哈里发严格监督，甚至让人在集市上宣布，凡有申冤者，无论何人，皆可直接向他禀告。因而，他赢得了巨大的威信。

对于“他打着宗教旗号对阿拉伯人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布热深有感触。他在1846年3月3日写给基佐(Guizot)的信中写道：“阿卜杜·卡德尔对民众的巨大影响比他的军事行动更可怕得多。任何部落都无法抗拒他。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战士便拿起武器跟他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他总是衣着俭朴。他在深夜起床，祈求真主保佑他的灵魂和他的部属的灵魂。他对人以礼相待，不愿对真主的奴仆妄自尊大，不愿表现出高人一等。他廉洁正直，从不愿为私事动用公款。他为穆斯林黎民百姓秉公断案，执法冷静而严格。

阿卜杜·卡德尔正是从信仰和虔诚之中获得了抗拒敌寇和承受失败的力量。

这位埃米尔主张对穆斯林居民实行移民政策，目的是使居民到他的素丹国居住，或者是使他们撤退到残存的领土。他在对部落发布的告示中一再提起这种人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根据埃米尔的信仰，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外交。他笃信伊斯兰国家的君主会援助遭受不幸的兄弟。他曾经谦卑地命令以当时在整个阿尔及利亚西部具有深刻宗教影响的摩洛哥素丹的名义作祷告。他谦称是摩洛哥素丹的哈里发，并且把他在1837年从路易·菲利浦那里接受的礼品奉送给摩洛哥素丹。作为交换，他理直气壮地要求摩洛哥素丹提供武器。后来，在获得谢里夫君主的庇护之后，他又毫不迟疑地在摩洛哥的部落中鼓励圣战并且招兵买马。尽管他从不承认奥斯曼素丹是他的君主，但是1840年和1841年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奥斯曼素丹，请求帮助反对“异教压迫者”。另一方面，他从不讳言曾经与基督徒谈判，但仅仅是为了迷惑对方而已。

令19世纪的法国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位没有强大的正规军、几乎没有火炮和财产的阿拉伯首领，如何竟能在1841~1847年期间抗击统帅一支大军（1841年7万人，1845年8.3万人，1846年10.1万人）、拥有大量军火和一个大国的资金的布热呢？在欧洲，人们惊讶的是，轻而易举地战胜过谢里夫帝国大军的布热竟然无法一举打垮一个年轻而脆弱的国家的军队。阿卜杜·卡德尔的敌手认为，他是伏击战和小型接触战的大师。他运用的是突然袭击、打了就撤，以及向高平原运动之后掉头猛攻泰尔（Tell）交替进行的战术。他在给布热的信中写道：“当你的军队前进时，我们就撤；当你的军队被迫撤退时，我们再返回，……我们要使你的军队疲于奔走，我们要伏击你的军队，我们要一点一点地把它摧毁，而让气候去做剩下的事”。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埃米尔最突出的形象莫过于一位独具一格的政治家和国家缔造者。具体而言，他的功绩在于要在阿尔及利亚创建一个靠伊斯兰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从政治上密切部落

或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有组织国家才能够对付一个强大的外国的挑战。

他同马格里布的所有改革者一样，打算把他的国家建立在严格的《古兰经》教条基础之上。例如，他取消了对被征服者收取的传统税收“卡拉依”（Kharaj），并且代之以按收成和牲畜头数收取的《古兰经》什一税“阿古尔”（Achour）和“扎卡”（Zakat）。他下令铸造一种新的银币，象征性地称之为穆罕默迪亚，并且在各种银质、铜质或青铜质的硬币上只印刻《古兰经》经文。

他的政府体现了一种神权政治。在政府中，权力被赋予宗教头人、神职人员、隐士和先知的后裔。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共同记忆中，他的时代曾经长期被称为“阿拉伯先知后裔的时代”。

阿卜杜·卡德尔的素丹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招降纳叛仓促建立的，没有时间完全统一起来。人们把它描写成围绕梅斯加拉省建立的一个邦联。阿卜杜·卡德尔政权所收服的领地被划分为哈里发领地（Khalīfalik）。最初是两个，即奥兰的加尔部（Gharb）和米利亚纳的夏尔克（Charq），1839年达到8个。每个哈里发领地下设阿甲领地（aghalik），由阿甲掌管。每两年任命一次阿甲。阿甲领地下设卡伊德领地（Caidat），卡伊德（Qaid）每年任命一次，但是可以连任。每个卡伊德领地下分若干谢赫领地（cheikhat）。埃米尔后来曾经说明：“我的命令下达给哈里发，并且逐级下达到谢赫。奏报也通过同样的系统上达到我的手中。”所有这些被授予权力的首领们都食俸禄，每个人的收入因其管辖权之大小而异。这些首领既是作战首领，也是行政官吏。此外，他们还在维持公共秩序和惩治犯罪方面行使司法权。凡属有关《古兰经》法律的大小事宜，尽归卡迪（Cadi）掌管。卡迪也领取一种固定报酬，但是不得收取受裁判者的传统礼品。

这个国家的主要实力以及中央政府对付部落封建势力的手段是正规军。1840年，可能有正规军1万人，其中有8000名步兵。

这些士兵分布在各个哈里发领地之中。埃米尔可以依靠这支军队逼税，而税收又使他得以供养军队和贴补公共开支。他当时曾设想建立一种征兵制度。他说过：“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要使用类似于法国人招兵的办法。”阿卜杜·卡德尔也能够从部落中招募非正规军。据估计，1839年非正规军的数量是5300人；另据估计，1840年达2万人。这支军队从来不缺少火药和枪支。或者从国外购买，或者在米利亚那制造。但是，它所拥有的大炮却寥寥无几。这支军队部分依靠国家供养，特别是从装满税粮和国家土地出产的粮食的官仓获得供给。但是，正如本·阿拉尔（Ben Allâl）哈里发所说的那样，“素丹的真正的实力在于大多数穆斯林对他的同情”。埃米尔总是能够找到志愿兵和非正规军。

一份由布热身边的人士起草的正式调查结论是这样写的：“要论埃米尔真正的实力，那就是他激起了人民对他的热爱。他打着他所捍卫的宗教的旗号，对阿拉伯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他具有非凡的、不可抗拒的威望。他的军队非常机动灵活”。

（杨 光 编译）

麦萨利·哈吉：阿尔及利亚 革命不幸的先行者

1974年6月3日，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了。死亡终于使他结束了流亡，返回故乡城市特累姆森，该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阿尔及利亚的当代历史人物中，象麦萨利·哈吉这样争议很大的人物并不多见。这位先行者在余生之年不得不奋力抗争，以便洗清叛徒的罪名。回顾麦萨利的一生，就是要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并且实事求是地再现这位曾经领导过“北非之星”（1926～193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党（1937～1946年）和“民主自由胜利运动”（1946～1954年）这些阿尔及利亚革命筹备组织的人物的形象。

麦萨利·哈吉是明确提出以独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他不愿沉醉于同化的幻想之中。他对于部分解决不抱丝毫幻想。他信仰解放和人民起义的力量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他的声望远超出了阿尔及利亚的国界。1959年1月28日，哈比卜·布尔吉巴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由是你一生的目标……历史必将说明，你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之父。尽管受到种种镇压，但是你以行动培养了千千万万久经考验的战士。”然而，把他赶下政治舞台的正是他所培养的战士。民族解放阵线以统一政治生活和必须实行一党制为理由，对他逐渐疏而远之，然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通过禁止他的政党活动，以行政手段排挤了他。

麦萨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诞生中起过何种作用？他的

个性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败落？麦萨利主义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正是要围绕这三个问题从麦萨利一生的事件、思想和他的政治生涯中寻找答案。

一个普通的阿尔及利亚人(1898~1923年)

艾哈迈德·乌尔德·哈吉·乌尔德·布贾尼于1898年出生于特累姆森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祖父在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后移居摩洛哥的乌季达，他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父亲在距特累姆森6公里的撒夫撒夫经营4公顷的一小块土地。土地收入微薄，难以养活自家以及与他家合伙的一家亲戚。冬天，他还到蒙大涅克的一个驿站去做工，寻求一份补充收入。特累姆森的居民看他持重、虔诚、干活卖力，就委托他看护西迪·布迈丁的陵墓。后来，他的一家因缴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离开撒夫撒夫。

如果说麦萨利从他父亲那里懂得了对土地的爱，那么，卡迪出身的母亲则使他受到宗教的熏陶。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她教他区分忍耐和屈从，并且谆谆教导他以礼待人，以至后来奥兰军团的战友们都把他看成是“小大人”。

在这个每日为生活而奔忙，7个人合住一间房的家庭里，麦萨利不能正常上学。他很早就退了学，步入了生活的课堂。教育对他来说是一种深深的向往。成年之后，他成为一名刻苦的夜校生。“我象水上飘荡的瓶塞一样生活。”麦萨利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这句简洁的话概括了他一生中的头20个春秋。9岁时，他学习理发，后来又学修鞋。10岁时，他离别家人，到距特累姆森10公里的埃尔·古第家中去作杂货店伙计。从此以后，他不得不只身在店铺后间生活。这些早期的经历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培养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乘一次宗教节日的机会，他返回了特累姆森，并且在他母亲的庇护下住了下来。他失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一家卷烟厂招去做贴标签的工作，后来因禁止儿童做

工的法律而被解雇。麦萨利与工会的头一次接触并不成功。解雇引起他的强烈不安。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他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解释。他暗想，“谁要是能给我解开这个秘密的钥匙，他就是我的真主”。“我想，只有法国人的学校才能使我摆脱这个时刻萦绕在脑海中的念头。”三个月以后，本区的一位小学教师默哈迈德·克卢什让他复了学，他同时还在德加瓦教团的哈吉·默哈迈德·本·耶累学校上学。1916年，他未能取得初等教育毕业文凭，离开了学校，踏上了通向舅舅的杂货店的道路。他在那里当了一名职员。

义务兵役制扩大到阿尔及利亚人头上之后，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使他走上了个人冒险的道路。

1918年，麦萨利参加了法国军队。他离开特累姆森来到奥兰，被分配到奥兰第20军团军需处。1918年4月第二周，他乘西迪·布拉欣号船前往法国。他驻扎在波尔多，举目无亲，必须自己开辟道路。

麦萨利在青年时期受过多种影响。所有影响都来自被剥削阶层，有时也来自一些与其观点一致的法国人。他是一个主张漠视人间荣华富贵和疏远当权人物的教会门徒，认为在下层社会阶级中才有有德之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深信，法国人的优越地位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未来是属于伊斯兰的。作为默哈迈德·布瓦耶的学生，他所学到的是：阿尔及利亚苦难的根源不仅在于殖民化。古老的土地经营方式和人的因素也妨碍着国家的发展。幼年时，他认识了一个法国人科杜夫人，他视她为第二个母亲。他在巴黎与她重逢，而且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埃米丽·比斯干，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巴黎公社社员的孙女。通过科杜夫人和她那位在特累姆森穷人区免费为人治病的丈夫，麦萨利认识到法国人的另一种形象。

他在这些方面的个人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当时，他还没有任何确定的思想，而且远未想到有朝一日会投身于政治行动，并

且去同独占阿尔及利亚舞台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斗争。

在波尔多，麦萨利应邀去法国人家中做客，逛剧院，旁听波尔多大学课程，提高阿拉伯语素养。

1919年8月，麦萨利获下士军衔，并于9月休假一个月。他返回特累姆森，看到了一个发生过社会变革的城市。商业活动已使资产阶级致富，并且使许多工匠摆脱了贫困。他并不敌视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进步可能预示着阿尔及利亚人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对殖民地行政当局的顺从却使他不安。他暗想，他们是否会为了自身的地位而置人民于不管呢？当他接触到一些只关心自己晋升而置周围老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的官员们之后，这种担心增强了。他从前那种对精英的仰慕和尊敬因此而淡下去。他发现，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集团既没有这种精英的文化，也没有他们那种见识，而是期待着一种彻底的变革。此外，以1919年2月4日关于穆斯林土著居民诉讼法的法令为开端的改革没有涉及移民的权利，也没有涉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大多数。尽管选举团扩大了，但是纳税人选举制度和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1920年初，麦萨利被任命为上士。他的待遇提高了。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军饷是1.5法郎，而与他同时晋升的一位法国战友却领到7法郎。他感到待遇不公，并且向军队领导部门提出书面抗议，但后者却答复他说，根据《土著居民法》，他不能享有法国人的权利。一批支持1919年2月4日法令的军官在波尔多大学的雅典娜教室举行了一次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报告会，公开敌视移民，他便把战友们召集在一起，并提议掀起反对《土著居民法》的运动。他的提议没有得到丝毫反响，但却反映出一种行动起来的愿望，这种愿望与日俱增。1920年4月，麦萨利第一次买来了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阅读《人道报》使他的思想掀起一场“小小的革命”。法国铁路工人的总罢工告诉他，存在着一种工人的团结和一种新的斗争方法。后来，他长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新